

“你想想，我们自己正在关里打得不可开交，东北可用的军队大部分调进关里，留下的只是一些没有什么战斗能力的部队。万一日军攻打上来，我们东北方面是腹背受敌，怕是招架不住。为了息事宁人起见，我方尽力忍耐退让，不使发生事故。万一发生事变，也不欲使事件扩大，只有敌来我走、敌退我守之一策。张副司令和中央的意旨也是如此。我们身为地方官吏，守土有责，本应作一种积极的打算，才不负人民的委托。但是东北不仅是我们的东北，而是东北人的东北，更是全中国和全国人民的东北，我想中央政府必有妥善的应急办法。”他说到这里，反问我：“你看时局能怎样？”我说：“日本人向来是沾边必赖的（实际上不仅是沾边必赖，而是无端侵占），这次不得到便宜，怕是不能完事的。”臧式毅说：“关于中村事件，我们已承认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但是日本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强硬要求我们履行过去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的所谓二十一条的一些条款，这是我们无法承认，也是无权承认的。事已至此，只好听之。但我决心不作卖国的勾当。”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

“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

花谷正 原著

张德良 译注

译者话：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通称“满洲事变”），是从柳条湖事件即沈阳事件开端的。花谷正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都是密谋策划柳条湖事件的核心人物，也是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罪犯。1931年，花谷正任日本陆军少佐、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补佐官，后因侵华“有功”擢升少将。在1946年至1948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板垣被列为甲级战犯判处死刑。石原因病，庭外提审，旋病死。花谷正这篇回忆录写于1956年。在本文中，他仍然坚持反动立场，观点亦极荒谬，处处为日本统治集团和他们自己侵略中国开脱罪责，并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敌意。约略言之，以下两点必须澄清。

第一点，“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基本国策在新形式下的实施。早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即逐步确定了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包括所谓海洋政策和大陆政策。这些都是有据可查，并且列为“基本国策”，逐步地付诸实施的。吞并朝鲜和霸占台湾、辽东半岛就是实施大陆政策的早期行动了。1927年田中内阁时代，明确提出了“灭亡满蒙”的新大陆政策。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夜，已经形成了完整地变中国东北为日本殖民地的理论和政策。例如“满蒙是日本生命线”和“武力占领满蒙”的叫嚣，成了日本政府、军部、财阀、右翼团体的流行语。又例如日本参谋本部的《1931年度形势之判断》、关东军司令部的《处理满蒙问题方案》、日本陆军省《解决满蒙问题对策之大纲》等内部正式文件中，对侵略中国东北的具体方法、步骤、策略乃至肇事的时间、地点，都明确而详尽地作了规定。所以“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新步骤而已。板垣、石原、花谷等人正是新大陆政策的积极鼓吹者和推行者，是当事人并非局外人。可是花谷正这篇回忆录，避开日本侵华的既定政策，硬把“九·一八”事变说成是从板垣、石原、花谷等几个人的头脑中凭空设计出来的方案。仿佛事变的发动、事态的扩大、傀儡国的建立，都是他

们几个人的“杰作”，这纯属弥天大谎。

第二点，应该承认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确实存在着矛盾。但这种矛盾只是在侵略中国东北的步骤、方法、策略方面的意见分歧，绝非实施“基本国策”的对抗性矛盾。相反，在侵略中国、变中国东北为日本殖民地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的利益一致，意见一致。例如在花谷正等人制造柳条湖阴谋事件的5分钟之后，板垣就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下达攻占北大营和沈阳城的4项命令；3个小时之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下达了攻占南满各军事要地的8道命令；8个小时之后，日本中央军部会议一致认为“关东军此次之行动是完全合适的”，并同意增派援兵；6天之后，日本政府公开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声明”，认为日军是“自卫”，应当“先发制人”；并且这个声明是在军部起草基础上写成的。花谷正在回忆录中无限夸大日本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把板垣、石原和他自己等少数军人说成处处主动，日本中央军部和政府处处被动，而由他们牵着鼻子走；他们是背着政府和中央军部的孤立行动，他们有反对日本财阀的纯洁理想等等，这些均属无稽之谈。

关于这篇回忆录，我们并不是赞同他的荒谬论述，而是因为它具有第一手史料价值。例如：“柳条湖铁路是谁爆破的？”这一桩重大历史疑案，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都没有得到解决，读了本文，当可涣然冰释。其它关于“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帝国主义策划阴谋的真相，本文也可作参考。

编者按：下面这段序，在日本右翼中是很多人所持的观点：认为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没有错。错就错在不应该进而发动“七·七”事变，及后来的太平洋战争，结果弄得鸡飞蛋打。殊不知即已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就如脱缰之马，不可逆转，势必不断扩大侵略战争。

序

在东京审判（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业已查明：应把太平洋战争的起点，追溯到满洲事变。的确，柳条沟（注：系柳条湖之误）事件的爆炸声及以后引起的连锁反应，竟使我国卷入了无休止的大规模的战争。今天回想起来，满洲事变如果按照我们当时设想的路线处理，多少会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

发动满洲事变的当时，无论从时机或方法来看，都绝不能认为有错误。当时，形成对立集团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必然趋向。日本没有满洲，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反之，如果置之不理，那么来自张学良及其背后的南京政府的排日（译者按：当时南京政府并不排日），日本就会失掉在中国大陆上的立脚点。我们面对世界出现的危机，只有使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才是日本前进的必由之路。我们还相信，使受虐待的满洲居民，建设王道乐土，乃是稳定远东秩序的上策，而丝毫没有打算愚蠢地同中国本土进行无止境的大规模的战争。

作为满洲事变开端的柳条沟事件，今日除我以外几乎没有人能把它说清楚了。因为，大部分的当事人已经死去。迄今为止，即使有人做过一些含混不清的猜测，但是，谁也没有能够说出事件的真相。我想一边追忆往事，一边把当时的情景记述下来。

在旅顺偕行社聚会研究

我到满洲当关东军参谋，是1928年8月炸死张作霖两个月以后的事。又过了两个月，石原莞尔中佐也到任，当作战主任。完成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不论怎么说也应该是石原。此后，到满洲事变发生前，其间除开一年时间外，我和他交往密切，促

膝谈心，深知他的为人。石原是第一流的军事学家。从少年时代起，就研究弗理德里希大帝、拿破仑战史，树立了站在军事学立场上观察问题的世界观。

虽然他是日莲宗色彩很浓的信徒，但是作为一位思想家，在当时的军队中也是罕见的，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他在私生活方面也是一个正人君子。他年轻时究竟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是，嫖娼宿妓、酒席宴乐等等，一概与他无缘。他的唯一的“短处”，就是能比别人早10年、20年预见到后来发生的事情。他说的事情，称赞他的人，认为是天才的见解；贬低他的人，则看作是离奇古怪的，或者误解为脱离现实的。然而他决不是梦幻式的理想主义者，而是能够制订周密计划，敢于雷厉风行的胆略家。满洲事变初期的作战，就曾引起世界军事学界的震惊。

我到满洲不久，炸死张作霖的真相就逐步明朗化了。河本大作大佐被召回东京受审，使当地的气氛无法平息下来。为了调查皇姑屯事件的真相，宪兵司令官峰，于10月间抵达满洲。由于关东军方面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结果一无所获。峰在归国途中，路过朝鲜，向驻朝鲜日军司令官倾诉了苦衷，军司令官马上召集中队长以上军官，设晚宴招待。宪兵司令官峰在宴会席上的闲谈里，从亲自执行爆破作业的龙山工兵队神田中尉的口中，得知了有关皇姑屯事件的情况说明，峰就算完成了使命。

河本大佐利用炸死张作霖之机，占领南满的打算失败了。如果成功的话，后来的满洲事变，也许在那个时候就爆发了。相反，登上新的东三省统治宝座的张学良，不久就实行了易帜，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和南京政府相呼应，发起排日的攻势。满洲的形势也日趋恶化。另一方面，北方苏联正在着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逐步充实战备实力，即将成为与我国相毗邻的远东的一大敌国。石原对苏联的实力发展，给予了特殊的注意。创

建满洲国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正是在于筑起一道遏止赤色势力南下的防波堤。

再说，在炸死张作霖以后，板垣征四郎大佐也前来就任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板垣与石原相比，具有相反的性格。板垣不是秀才型的人物，他具有宽宏大度、坚韧不拔的性格。是一位阅历丰富的领袖人物。板垣的实际能力和石原的周密计划能力的结合，铸成了满洲事变的大业。我们这样说，并非过誉。

于是，我们就面临着日益恶化的满洲形势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每周一二次在旅顺偕行社聚会热心地进行议论和研究。这件事情的动议，起源于1929年7月畑英太郎中将（畑俊六元帅的胞兄）代替村冈为关东军司令官到任之时。我们首先想分辨清楚新任司令官对满蒙问题的见解。经过探询，确认中将对抱此抱有充分理解的态度。当天夜里，我们三人会面，就当前满蒙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石原中佐提议：“利用旅顺安静的环境，从世界形势和满蒙现状出发，研究我们应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为此，每周一二次在偕行社聚会，彼此推心置腹，坦率地交换意见，不明白的地方，向有关专家请教。再有，应当扩充不只是调查中国马的中国马调查班，以进行更高水平的研究。石原的提议获得了一致意见，以后3人每周都要聚会进行研究。

我认为新的满洲，要以双重国籍的日本人为骨干，以建设各民族共同享受的王道乐土。日满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犹如月亮之沐浴太阳的光辉一样。那时的设计是：日本人从事大企业和脑力劳动，朝鲜人从事农业，中国人从事小商贩和体力劳动，各尽其职。以达到共存共荣之目的。因为是拯救受虐待的满洲人，以建设王道乐土，所以不允许像日本内地那样，大资本家横行肆虐。我们一贯主张禁止财阀进入满洲。我们引进“日产”康采恩，也是因为“日产”公开招收广大群众的股本，

我们只不过是单纯地利用其经营技术而已。

进入1931年，我们的计划很快地具体化了。这是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满洲粮食价格的暴跌，张学良铁路平行线的奏效，及满铁财政赤字的大量出现而造成的。

参与谋划的人们

1931年春，制定了柳条沟事件的概略计划，制造战争借口显系轻而易举，可是问题在于处理善后难。吸取了炸死张作霖事件的教训，这次制订了周密计划。今天看起来，那时炸死张时机并未成熟，只是杀掉了一个人，事后所应采取的行动则一无所成。当时既与中央军部全然没有联系，又与毗邻的驻朝鲜日军也没有任何磋商；日本国民对满洲问题也很冷淡。总之全国上下步调不一致。加之，既使用日本浪人，又使用中国游民，结果日军的阴谋全部败露。这次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满洲事变一经发动，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动军队，一夜之间占领奉天（沈阳）；在列强干涉尚未介入之前，即应迅速占领预定地区。那时当然必须考虑来自政府和驻外地外交官员方面的干扰，然而如果犹豫不决，必将一事无成。因此，那时有必要实际上置中央命令于不顾而加以强制推行。为了使关东军的行动得到支援，可求助于中央军都将校中的骨干分子，把他们拉到我们一边，引为同志，实行内应；还有桥本策划的国内军事政变若能和满洲事变同时并举，那就更属千载难逢的良机；还必须取得毗邻的驻朝鲜日军的适时增援。

值得庆幸的是，驻朝鲜日军参谋神田正种中佐，在满蒙问题上阅历较深，赞同我们的计划，因此一旦有事的时候，可以指望从驻朝鲜日军那里得到援助。应石原的重托，神田中佐在满洲事变发生前，大约三次来访旅顺。他出身于俄国班，也在

哈尔滨特务机关任过职，是俄国通的硬汉子。他来到驻朝鲜日军后，发现朝鲜事态的发展，远较预想的要更坏，为此他大吃一惊。朝鲜人的排日气氛，一直贯彻到朝鲜儿童的意识里，如果单独一个日本人到乡村去，则有生命危险。这也是受到满洲的中国人排日影响的结果。因此，从驻朝鲜日军的立场上说，也有必要发动满洲事变。

展示最初计划之时，恰值驻朝鲜日军司令官南中将任内。南面有难色，向神田表示，自行越境显系无理。林銑十郎中将上任以后，征询意见时，他表示充分理解，这才放心。另一方面，在中央军部，当时由第二部长调任第一部长的建川美次少将，从他处理张作霖事件的原委看，他是最可信赖的。任参谋次长的二宫，是一个精明人，因此有点靠不住。可以无条件信赖的人有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大佐、中国班长根本博中佐、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三人，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也是一位大致可以信赖的人，对他们透露我们计划的程度，如果用数字表示的话，那么桥本、根本为95%，建川、重藤为90%，永田为85%，小矶、二宫为50%。

6月，我为了和他们作大致的磋商，返回了日本内地，会见了桥本、根本，同他们交换了意见。他们二人正热衷于国内改造。我们一致的意见是，如果发动满洲事变，国内改造也将容易进行。桥本是政变第一主义者，主张首先举行政变。结果相约10月同时举行，至于详细的爆破计划，他们并没有多加过问。

8月，召开了师团长会议。南陆相陈述了对满蒙问题的积极意见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时因为关东军司令官、驻朝鲜日军司令官、驻台湾日军司令官都出席了会议，所以板垣大佐也跟随新任司令官本庄繁晋京，神田也是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的随行人员。

这时，到兴安岭进行地志调查旅行的中村震太郎被杀事件发生了，接着又有万宝山事件，满洲的气氛日益紧张，实施计划的时间日益逼近。8月下旬，我到东京。任务是使中央军部认识满洲实况，在中村事件中，我曾以奉天特务机关补佐官的身份同张学良的官员谈判。但是越是反复交涉，问题越是纠缠不清。于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实力发动。可是不知中央军部究竟有什么意见，想再一次弄清情况。

我同二宫、小矶、建川、永田等交换了意见。二宫、建川特意嘱咐说：“按照现状看，中日两军近期内势必发生冲突。因此请考虑对策。如果冲突一经发生，即可听凭关东军做临时处置。关东军必须慎重地考虑国际形势，周密地计划自己的行动，直至每一个细节，以避免外来干涉”。同时对于发动群众的场所、是否把局面控制在南满范围，作战的时间，兵力的估计，转换为外交交涉的时间，对住在北京的张学良如何处理等项问题，也都作了商讨。二人还根据我讲的情况，要我领会言外之意：“对于政府将来能采取怎样一种态度，现下虽不得而知，但应尽可能努力贯彻贵军主张为是。”双方就这样约定了。

后来会见桥本、根本，我对他们说：“因为准备完毕，所以按预定计划坚决执行”。根本劝我延期执行，他说：“现在看来，如果想实现计划，我很忧虑能否得到国内支援。特别是若槻内阁很难办，因此是否等到推翻内阁之后再说。如果操之过急，恐怕只有逼得本庄先生剖腹自杀了。”我说：“事到今日，更待何时，箭在弦上，唯有一放。”就这样返回了满洲。

现场的同志们

我们究竟怎样进行现场谋划的呢？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是1931年8月到任的。虽说是新上任，然而他是与中国交往

人员中的老前辈，是一位性情浑厚、人格高尚，堪称将才的人。

他作为重大时期的军司令官是个适任的人选，中央人事当局似乎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确定的。我们关于事情的细节，虽然什么也没向本庄先生讲，可是根据平时的观察，我们判断：“一旦有事，他一定是可以信赖的人物。”

三宅参谋长等幕僚中的大部分并不知晓计划，爆破工作分派给4月到任的张学良的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少佐的补佐官今田新太郎大尉承担。今田大尉的父亲是个汉学家，他本人精通剑术，是一个天真、固执、富有正义感的热血汉。

因为在超越必要的人物中泄露秘密很危险，所以在人选上是颇费一番苦心的。爆破工作如果交给一般非军事人员去做，无论如何容易暴露，因此只有使用军人才是上策。既然在爆破后，必须立刻集合部队开始行动，那么，无论如何需要向驻奉天部队的骨干分子透露秘密。因此必须一个人一个人地使之尽情饮酒，畅所欲言，然后向志同道合的人，讲明计划，巩固团结。

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即川岛大尉、小野大尉（他们都是驻奉天独立守备队岛本大队的中队长）、小岛少佐（驻奉天第二十九联队副）、名仓少佐（驻奉天第二十九联队大队长）、三谷少佐（奉天宪兵队）等人。辅助作业则由甘粕正彦预备役大尉、和田劲预备役中尉等人参加。岛本大队长因为不摸情况，所以在事变发生的当天夜里，完全如晴天霹雳一样，感到事出愕然。

另一方面，与柳条沟事变发生的同时，向满铁沿线各地投掷炸弹，以治安不良为理由，由领事出面要求增援，再以此为理由，迅速出兵。为此，令甘粕正彦等人潜往。9月18日刚过，在哈尔滨和吉林所挑起的类似事件都是预先筹划好的。

还有现场的警戒和联络工作，指使无法谋生的浪人和青年充当，由和田劲统率。经费从日本内地筹措，由河本大作经手

送交,当时活动经费还算宽裕。

谋划的暴露

我们最初,预定于9月28日实行爆破,以爆破声为暗号,用安装在奉天日军驻地兵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译者按:一说安装在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队部内)内的24厘米的要塞炮,炮轰北大营中国驻军兵营。与此同时,驻奉天部队夜袭奉天城,随即占领之。然而这种要塞炮原来并不在此地。这年春天,永田军事课长来满洲视察时,我们向他说:“在满洲的关东军总兵力不过1万人,张学良的军队素质虽然不好,但大约有22万人,还有从法国购入的飞机30架,而我们在满洲不但一架飞机都没有,而且在奉天连一门重炮也没有。如果一旦有事的时候,还能不陷入困境吗?”于是从旅顺(注:从日本东京运至旅顺后,又密运到沈阳。)把要塞炮拆开,运来奉天,然后再重新安装。若说安装重炮,太使人神经过敏,所以便以打井为名,将周围圈起来,这样外人便看不到里面在干什么了。即使这样,外边的人还是觉察到了,如领事馆就曾前来探听过。虽说是24厘米口径的大炮,但性能不好,安装也不好,再加上没有会操纵的炮兵,于是一开始就计算出距北大营的水平射程,把瞄准器对好,放在那里,这样即使闭上眼睛发射也能命中,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让它起威吓作用,并不指望它发挥多大的实际效果。

这个重炮虽说9月10日就已安装完毕,但还要教会临时炮兵的操作技术,因此仍需花费时间。而且割倒高粱后才适于作战,高粱繁茂就难以发现躲藏的敌人。从这个观点出发,选定9月28日。这个日期之所以提前,是由于发生了下述情况的缘故。

9月15日,特务机关收到了从很早以前同我们有联系并进行过接触的桥本中佐那里打来的电话。其中说:“因为计划暴露,

决定派建川前往满洲，请我们不要犹豫，要尽快行动。即使建川到达也来得及，要赶在尚未听到建川传达中央命令之前行动。”

后来，我才听说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满洲策划的种种事情，当地的外交派出机关，隐隐约约有所觉察，风声甚至越过了海洋传到内地。其原因我估计是由于我用钱收买的浪人的酒后狂言，或者是弹药和物资的集中而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以及我借助酒兴说些夸口之谈所造成的。总之，那些情报是先传到币原外相的耳朵里，然后被带到内阁会议议席上的。

陆军大臣是南次郎，此人是一位东洋长者式的不着边际的人物。币原提出的种种问题固然百般挑剔。可南次郎也只是作些不得要领的回答：“我认为军队不会任意干出那种事情，那是偶发事件。”币原将奉天总领事林打来的电报给他看，他显得有些惊慌，并表示：“究竟是否属实，调查一下再说。”他这样回答之后，回去就把第一部长建川叫来。建川听过南的询问之后，回答说：“难以否认‘在满洲正策划着某种事件’的谣传。”于是南说：“那可难办了，你应该去到那里劝阻。”就这样建川以“和事佬”的身份只身前来奉天。可是，建川感到事情棘手，就把桥本和根本叫来。在建川的暗示下，桥本立即将前边说过的那封电报拍发给关东军。

这时，桥本等中央军部的同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当时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由东京归任途中，18日在汉城和神田中佐相会后，回到奉天。建川于15日夜，从东京出发，一路上慢悠悠地乘坐火车、联络船，潜往满洲。18日午后和到本溪湖车站前去迎接的板垣大佐一道从奉天站下车。我马上用车把建川从车站送进奉天柳町的一家带有艺妓的菊文高级饭店。

九月十八日夜

另一方面，我接到桥本电报后，9月16日午后，在奉天特务机关的二楼上，有关全体人员聚集一堂商议对策。这一天，恰值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首次巡视。板垣、石原也正好逗留在奉天未走。到会者除板垣、石原、我和今田以外，有执行部队川岛、小野两大尉，小岛、名仓两少佐。奉天宪兵队长三谷少佐缺席未到。

围绕着是否坚决执行既定计划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的主张是：“建川是奉谁的命令前来，还无从知晓。假如是奉天皇之命前来，我们就将变成乱臣贼子。果真如此，还有没有坚决执行既定计划的勇气？总之，在没有和建川相会之前，是无法决定我们将如何行动是好。”但是今田却说：“我们的既定计划，已被泄露。所以必须趁没有会见建川，大家没有泄气之前，务必坚决执行为好。”因为争论不休，没有结果，最后通过划拳，姑且听从了我的意见。

可是到了第二天，今田来到了我的住处，他说：“无论如何要在建川到来之前动手。”我说：“还是要和东京合拍，而后执行方是上策。”尽管我怎么说，可是今田怎么也不听从，最后我也只好同意说：“建川方面由我亲自去说服。”就这样约定，并且决定18日夜坚决执行。首先叫来了小岛，接着又叫来了川岛、名仓。我宣布说：“18日动手已经定下来了。小岛，你们大队的任务是连续出击，要一夜之间攻占奉天城。川岛只要攻下北大营即可。”对于担任现场巡游队的和田劲也取得了联系。至此，一切准备停当。

18日，我到建川住的菊文饭店，同换上浴衣的建川，一边喝着酒，一边暗中试探他的意向。嗜酒的建川，尽管从风度上看是一位从容不迫的豪杰，可是他也是一位具有头脑缜密、感觉敏锐

的人。对于我说的事情，他似乎已基本理解，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竟然今晚动手。然而他绝对没有制止之意，这大致还是清楚的。于是寻找适当的机会，当建川欢乐的时候，我丢开了他，回到了特务机关。板垣也回来了。石原跟随关东军司令官，于前一天去旅顺，今田因为跑出去指挥计划的实施，不见他的踪影。

9月18日夜里，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800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10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炸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使在满铁线路上驰骋着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事先让工兵作了计算，直线单而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遇上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也只要它暂时地倾斜一下，还能够通过。根据计算所得的这个安全系数，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在炸毁路轨的同时，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报告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这时呆在爆破地点以北4公里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进攻北大营。今田大尉不但在现场附近直接监督实施爆破作业，而且他是一个精通剑术的人，发起冲锋时，他挥舞着军刀，亲自杀进了北大营。片冈、奥户和中野等雄峰会的一群浪人，也从旁协助，在特务机关方面，岛本大队长一无所知，宴会回来，正在熟睡。得到紧急报告后，慌忙赶到现场，这时板垣代理军司令官业已下达命令，令第二十九联队和岛本大队，立即集合部队，参加战斗。

在北大营，一无所知的中国军队，多数人还睡在梦乡，带着武器库钥匙的将校军官外出。士兵拿不到枪，正在赤手空拳，东奔西窜时，日军已经冲进兵营。还有一种说法，中国军队很早就得到内部命令（注：指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自己逃出了营房。随着24厘米重炮的轰击声过后，就开始了向北大营的炮击，使得大部分中国军队败走，到黎明时，奉天全城都落到我们手里，很快就实行了全城军管，土肥原大佐就任奉天临时市长。

中央军部的限制

我接到爆破的报告，立即拍电报给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石原中佐召集全体参谋开会，向军司令官说明了作战方案，军司令官马上批准了这个作战方案。于是，军司令部在19日早进驻奉天，分散配备在满铁沿线的第二师团主力，除了防守吉林方面的驻长春部队之外，都迅速地向奉天集中。独立守备队在各自配置兵力的地方采取行动，分别占领了凤凰城、安东、营口等地。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銑十郎中将以及第二遣外舰队（注：停泊在青岛和旅顺）司令官津田静枝少将请求协助增援。津田司令官对于将海军集中于营口的请求，以山东形势不稳为理由加以拒绝。此后对于满洲事变的进展，海军方面，常常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驻朝鲜日军方面，当我们认为可以畅通无阻时，也出现了预想不到的障碍。19日早，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銑十郎发来电报，内称：“驻朝鲜日军司令官，为了应驻奉天附近关东军之紧急请求，自行决定将旅团长指挥的第五步兵大队和第二飞行中队派往奉天”。大家看到这里都在为由于神田的努力，终于促使林下定决心而欣喜。往下还看到电文上写着：“派出部队，从10时起，陆续由卫戍区出发”。可是就在同一时刻，中央军部作出的判断

却是满洲形势并不严重。于是给驻朝鲜日军下达了命令说：“越境出兵须待圣上裁决，在未获批准前，不得擅自行动。”为了更加彻底贯彻这一宗旨，还给新义州的宪兵队长发一封电报：“如有越境部队，即令其停止前进！”就这样，越境计划暂时受到了阻碍。

在那天的半夜里，从驻朝鲜的日军方面又拍来了一封令人失望的电报。其中说：“参谋总长对卑职再三陈述的意见，竟置诸不顾，严禁派出增援部队。”我们的既定计划是：一俟20日早驻朝鲜日军到达奉天，关东军即行北上，出兵哈尔滨。恰好在我们布置部队集结于长春之时，接到了这封电报，真令人气愤万分。

正在这时，从神田那里又得到消息说：“如果关东军出兵吉林，则驻朝鲜日军以奉天守备薄弱为理由，可再次越境”。21日早，我们指使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令其投掷炸弹，然后以保护侨民为理由出兵吉林。驻朝鲜日军按既定计划，命令嘉村旅团自行越境，抵达奉天。神田为了制造出兵间岛（注：即吉林延边地区）的借口，到过龙井村，进行密谋策划，但没有成功。

我们的计划是按照上述顺序，迅速果敢地占领整个满洲，因遭到中央军部的阻挠而难于进行。中央认为如果放任自流，关东军还会惹出事来。所以，首先派兵务课长安藤大佐来到满洲，他向我们提出质问说：“东京方面，盛传此次事件是关东军的阴谋所为，你们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接着在月末又派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桥本虎之助少将来到满洲，他作为中央军部的监察官，逗留在奉天，凡事都想过问，以牵制我们的行动。然后参谋本部又给我们发来带侮辱性的罗里罗嗦的指示，一般地说，这样的指示是不应该向关东军这样的大机关发布的。

我们认为占领吉林以后，无论如何也要出兵哈尔滨。为了制造出兵的借口，甘粕正彦大尉悄悄地潜入哈尔滨。9月21日以

来，向正金银行等几栋建筑物内投掷炸弹。见效后，由哈尔滨总领事以及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百武出面，打电报请求出兵保护当地，关东军再三要求中央军部派兵，但中央军部害怕出兵哈尔滨，会惹起苏联方面采取行动而加以拒绝。

参谋总长下达了如下严厉的命令：

- 一、不准进兵宽城子以北；
- 二、不准管理满铁以外的铁路；
- 三、未获参谋总长的指示，不准采取新的军事行动。

既然如此，只好暂时作罢。

占领哈尔滨已是第二年1月的事了。这时我们同上海的田中隆吉少佐合作，点燃了上海事变。趁着混乱局面，很容易地就结束了作战。

我们以石原为中心所作的判断是：即使出兵北满，苏联也不会出兵，国际联盟也好，列强也好，没有干涉满洲事态的实力。当时美国、英国、法国的利害关系，使他们在远东互相对立，不能形成一个遏止日本的联合体制，苏联也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无暇兼顾西伯利亚以外的事情。然而若槻内阁害怕国际联盟方面排斥日本，中央军部也过高地估计了苏联的实力。把超过限度的行动看成是冒险。

然而就此止步，将和3年前一样半途而废。为了改变政府的怯懦态度，我们的行动是10月8日轰炸锦州。此时，石原亲自搭乘小型飞机向锦州张学良的驻军兵营投掷了小型炸弹。实际的损害虽然很小，但给予国际联盟的震动是很大的。桥本一伙大吃一惊。便来责问我们。但遇到针锋相对的回答。他们一气之下回国了。这次轰炸事件，促使国际联盟对日本的态度急剧恶化。我们达到了目的。

对不服驾驭的关东军感到棘手的中央军部，于10月中旬派

遣侍从武官川岸少将前来“慰问”。我们正打算聆听圣上嘉奖“干得好”的赞语,可是侍从武官到来的当天早晨,却收到了由陆军大臣拍来的电报:“外间有关东军闹独立的谣传,必须切实中止此项企图”。这是连做梦也没想到的事,简直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事后还听到,与此同时,逮捕了“十月事件”的首谋者。其原因可能那时不知是谁散布的谣言,被小题大作传开了的缘故。

(译自《理性》增刊,“昭和秘史”1956年12月号。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

桥本大佐手记

桥本欣五郎 原著

张德良 译注

译者的话:《桥本大佐手记》原书名为《昭和历史的源泉》,1935年4月23日动笔,同年6月1日完稿,发现于1961年。译文选择了《手记》中“九·一八”事变部分加以节译。

《手记》的作者桥本欣五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为樱会的主要首领,日本陆军中佐、陆军参谋长部俄国班班长。1935年写作《手记》时,任三岛野战重炮第二联队长,晋升大佐。他是日本国内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军事政变的主谋者;是“九·一八”事变的阴谋策划者;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罪犯。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搜索到他的《手记》幸免于绞刑,被判无期徒刑。假释后,于1957年病死。

《桥本大佐手记》和花谷正《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两文所坚持的反动立场和荒谬观点,如出一辙。但是两文所提供的第一